

编辑：陈朋
美编：石岩
星期日
组版：韩舟

A 拿别人的经验套中国，这就叫学徒状态

近日，汇聚中国当代132位人文社科学者访谈的《中国当代学人访谈录》发行。在该书座谈会上，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说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学徒状态，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。

“为什么西方国家没出现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问题，中国居然出现了？为什么西方发展200年才遇到的环境生态问题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遇到了？”吴晓明反问，“不是说人家先进，你跟着学，自己就先进了。我们不仅要学，还要有思想。”



齐鲁晚报：您说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，是一种学徒状态，这话可以说震惊了很多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

吴晓明：先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在中共早期历史上，有个极富盛名的组合——28个布尔什维克。这28个人从苏联留学回来，马恩经典倒背如流，俄国经验烂熟于胸。1927年以后，中共有了武装，这28个布尔什维克认为，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，因为马恩的原理说要暴力革命，俄国的经验说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，所以这28个人坚持这条道路，结果是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，他们在各个地方搞武装起义，一次次失败，损失惨重。

这就叫学徒状态，拿别人的经验套到中国的问题上来。一直到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，而是农村包围城市，到这个时候，中国革命者才摆脱俄国的学徒状态，获得自我主张。

齐鲁晚报：对西方亦步亦趋，缺少自我主张，这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很风靡吗？

吴晓明：很风靡。相比中共早期的28个布尔什维克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不过那时候的教条来自苏联，现在的教条来自西方。现在真正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很少。

齐鲁晚报：为什么不用自己的，反而迷信别人的？

吴晓明：举个例子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拿三五个经济学奖都不为过，但实际上我们一个也没有。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不能有效地阐述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，它的机理是什么，还不能提出自己的一套学术体系。当然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在关注这个问题，但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。

不光经济学，包括现在的科研评审、学术量化指标等中国学术制度，都是完全从西方搬来的。现在各个学校、研究机构等，评职称都要拿项目。为了得到项目，有些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一片乌烟瘴气。每年要报预算、决算，写很多报告、表格，费用又难报销，占用研究者大量时间精力。说到论文评审，你得想办法进评委会，否则评不上。要是有外评，大家就打听哪些人可能是评委，各个单位想办法把自己人塞到评委会里。这些从西方搬来的学术制度从来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。

齐鲁晚报：我们是不是一直这样？

吴晓明：回溯民国时候，那时大学根本没有项目一说，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个月350块现大洋。现在评教授，要讲究有多少项目、多少论文、档次怎样、多少奖，最后评出来了，实际上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可能另外一个人分数比你低，但水平比你高得多。

复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： 中国知识界 仍是“学徒状态”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B 西方没出现老人倒地不扶现象，我们出现了

齐鲁晚报：当学徒是不是一无是处？

吴晓明：当然不是。自近代以来，中国人不断向外国学习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这种学习中断了，到改革开放，邓小平就要求我们赶快学。可以说，改革开放头三十年，中国社会的最大需要是学习。而且我们要形成自我主张，一定要经历学徒阶段。现在问题在于，学来的东西要真正消化，变成自己的东西，这件事现在变得越来越急迫。

齐鲁晚报：为什么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了呢？

吴晓明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但是，我们也遭遇了高度的风险，一是环境问题，二是社会生活问题。

从环境生态方面来看，因为我们人口数量巨大，发展速度快，西方发展了两百年遇到的问题，我们三十年就遇到了，而且比他们严重得多。这些环境生态问题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结果，因为它就是向大自然不停地索取。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一味因循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肯定行不通。

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，我们国家居然出现了老人倒地扶不扶的争议，这在西方国家是无法想象的。这就是西方自由市场、唯利是图的原则在社会生活泛滥的结果。我们通常讲的自由市场，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唯利是图。古典作家把它叫作犹太本质，它也有积极意义，能激发人的动力，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。但是如果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泛滥，将造成严重后果。

齐鲁晚报：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老人倒地没人扶的现象，而我们却出现了？

吴晓明：这就牵扯到东西方的差异问题。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在西方有个强大的制约因素，就是救赎宗教。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讲，法律赋予美国人绝对的自由，但上帝使他们不得为所欲为。而中国是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，唯利是图的犹太精神如果随便扩张，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解体。事实上，我们正在经历这种危险，比如食品安全问题、各种道德问题等。

后才形成原子化个人，但是，中国学术界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这一点，他们一开始就讲个人权利、讲市民社会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。

齐鲁晚报：中国一直都是人情社会、血缘社会。

吴晓明：举个例子，这些年我很少带博士生，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业形势不好，而我作为他们的老师，好像就有义务帮他们找工作。到了就业时，他们就会找我说：吴老师，我要毕业了，这个工作的事情你也帮我费费心。而在西方，作为导师，我在你毕业时只需要帮你完成论文答辩，帮你写个推荐信就好了。在中国，老师和学生也是半伦理的关系，甚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是准血缘联系。这是非常不同的。

齐鲁晚报：东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别很大。

吴晓明：差别很大，比如我们老是说朝鲜是世袭制，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家族制。日本、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首相，它的叔叔是上一届的外相。印度也是，菲律宾也是，韩国也是。所以说，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。

齐鲁晚报：为什么在非基督教国家很难成功？

吴晓明：事实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。基督教教化使西方血缘的、伦理的、宗法的关系通透解体，产生原子化个人，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西方政治民主制的基础。而中国不同于西方，中国社会是半宗法、半伦理、血缘纽带特别紧密的社会。西方经过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之

D 西方人 已经不愿意学习了

齐鲁晚报：那中国学者如何摆脱这种学徒心态呢？

吴晓明：现在学者需要做的是研究中国的历史，研究中国的现状。现实跟我们通常讲的事实不一样，是本质的东西，要把握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拿了西方概念往中国社会上一套，实际上把事实完全曲解了。在这一点上，老一辈学者在关注中国现实方面做得更好。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，在接受外来学术时有自己的主张。

齐鲁晚报：那您觉得，中国要靠什么才能不做学徒？

吴晓明：有人说经济发展主要靠品牌，有人说主要靠技术，这些东西都是逐渐能解决的，我认为还要靠思想。现在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学习的民族，这也是学徒心态的来源。但是总有一天，当他面对很大危险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不仅要学，还要思考。

齐鲁晚报：您觉得，我们是一个爱学习、有活力的民族吗？

吴晓明：看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有没有活力，要看三个要素：第一，是否拼命干活。你去看欧洲，比如法国人过完了圣诞节上班，到四月份开始讨论暑假怎么度假，然后准备罢工，罢工完提高一点工资以后再过圣诞节，但中国人明显不同。第二，是否愿意生孩子。如果一个民族不愿生孩子了，他们人口自然递减，表明它活力丧失了。第三，是否愿意学习。西方人已经不学习了，美国最优秀的学子，包括耶鲁、哈佛的，只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，不再学习。对中国，他们只知道两件事，一个是天安门事件，一个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因为哈佛开这两门大课。但是，你去问中国的出租车司机，你说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谁会选上，他都能跟你谈上半小时。当然他可能胡说，但是他愿意了解外部世界。